

●姬中宪 专职社工,兼职作家,参与制订《社工国家职业标准》,著有长篇小说《闲尾》。

阳安置点里没有社工,所以想请我去介绍上海社工在都江堰的经验。现场全是官员和学者,由于是临时邀请,我被安排在会场的后排,旁边一位会务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社工,悄悄捅捅我的胳膊,问:“你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吗?”

在过去很多年里,我已经被这个问题,以及这个问题的其他形式反复问过无数次,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社工共同面对的身份难题,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与申辩,将贯穿在我后面的每一篇文字中。不过现在,我首先要应对这位会务组人员的提问,我说:“不是。”她马上追问:“那你们是来做什么的?”我说:“等一下听完我的发言,你就知道了。”会场设在德阳市政府大楼的最高层,外面就是楼顶的露天平台,我从会场悄悄溜到平台上,看看四下没人,我脱下上衣,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了工作服。

几分钟后,我穿着印有“上海社工”的黄金甲回到会场,开始了我的发言。

●刘念龙 新世纪第一批生物系大学生,科普写手。

质变性从而防止腐败,它也绝不会对手指和鼻孔另眼相待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浸泡和熏陶,手指尖的皮肤免不了大起皱皱,鼻孔已经被熏蒸得干痒难耐,而衣服显然也吸饱了足够的气味。

至此,你已经拥有了生物系最显著的名片,带着它开始午餐吧。你会发现,所有菜式都透着一股难以言表的甲醛味,好处就是,不再需要虚张声势地大谈番茄牛肉就是一盘细胞,人们就会对你退避三舍。绕梁三日的福尔马林,是生物系最大的名片和最强武器,对异性更是极具杀伤力——所以给生物系学生的第一个建议就是:不要在解剖课后约会。

第二个建议十分重要:如果你不想被当成菜鸟,请永远不要试图谈论解剖课上的口罩和手套。在低年级学生看来,那等同于和食堂阿姨讨论口罩是否应该罩住鼻孔——当然有好处,只是无必要。

●张志浩 法医一枚,著有一书《我是法医》。

社工是谁?

汶川大地震后,我作为上海社工赴灾区服务团的一名社工来到都江堰,临行前我们订做了统一的工作服:一件醒目的黄色T恤,过机场安检的时候,我们明显比别人过得更快。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:“我看到你后背上印了四个大字:上海社工。”

这件印着“上海社工”的黄色T恤,是我们带给都江堰人民的第一张名片。安置点的居民们亲切地称它“黄金甲”,社工们集体出动时,确实有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势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比那部同名电影的名声要好得多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经过几个月的服务后,板房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认识我们,说得为我们为他们带来了什么,而且,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开展工作的理念和方法,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,和他们过去早已熟悉的各类人员相比,有什么区别。这是对社工最高的肯定,胜过任何官方的评价和学术的总结。

台湾9.21大地震后,台湾社工也冲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,并且持续三

无防护解剖

八年前的世纪之交,当我带着狂妄开始大学生活时,绝对不曾想到,那个看似风光无限的生物系,能够给我以如许之多的闷棍。第一堂课难免惊喜连连,但第一堂动物实验课更多的是惊讶。

解剖台是每一个生物学菜鸟的憧憬之地,尤其是当你从入学第一天起,就已经拥有一套锃光锃亮的解剖工具时。事实上,这套工具恐怕也是贯穿大学始终的惟一道具。

解剖工具装在铁皮工具箱内,摇晃起来咣当咣当作响,声音单薄而空洞,却有着让人一试身手的鼓动性。掀开来一看,不过是包含有镊子、解剖刀、解剖针和解剖剪的四件套,每样虽然只有一件,却能实施挑、割、刺、剪等各式动作。理论上来说,从这副简单工具上练就的技巧完全施加于任何复杂生物——打心底里,我们都希望能在高级动物(最好是人体上)大展拳脚。所以,当得知第一个解剖对象居然是灰不溜秋的蚯蚓时,失落感不禁油然而生。

《爱的流刑地》的性窒息(上)

日本电影《爱的流刑地》是根据渡边淳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。

作为一名法医,“职业病”使我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:男主人公村尾菊治多次在女主角入江冬香的要求下,在性行为中有掐颈举动,在一次激情中竟然真的掐死了她——在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,男主角村尾菊治的行为,究竟是故意杀人,过失杀人,还是协助自杀抑或一起简单的激情意外?

先来看看电影中人物的各自观点。嫌疑犯不离文化人本色,他的答辩激情四溢而浪漫感人,他首先强调爱是不能被审判的,同时否认自己有杀人的故意,进而逼问身为女性的检查官:你就没有爱一个人爱到要死的程度吗?

但他的观点显然不值一驳或者说法官根本无法采信。

控辩双方则针锋相对。控方抓住掐颈能导致人死亡是生活常识这

年,受他们启发,我所在的浦东社工服务队也计划在安置点服务三年,考虑到选派的人员均是浦东各机构的专职社工,还要兼顾上海的工作,我们采用了分批分期轮流派驻的方式。对社工和板房居民来说,这意味着他们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告别,要一次又一次地等待重逢。我记得我们这一批社工离开都江堰的那天,大家特意思想早点出发,不要惊动他们,但他们还是早早赶到社工站为我们送行,一位老大爷提着前一天从山上一粒一粒捡回来的白果送给我们,一个只有九根手指的大姐带来了她亲手编织的生肖像,一位老人拉着社工的手,满眼是泪,一位当地管委会工作人员说:“你们让我认识了社工,在这之前,我从来不知道社工是谁。”

社工是谁?他们是一群什么人?他们是干什么的?对于众多没有实际接触过社工的人来说,这仍然是一个问题。

在四川期间,我受邀去德阳市参加了一次“板房社区管理研讨会”,德

落感不禁油然而生。

更糟的是,置身于充斥着福尔马林的解剖室,印象中那飘逸的白大褂、严实的大口罩和薄手套居然毫无踪影!没有了这些道具,惟一能让人酷起来的方法,就是装得满不在乎。于是我们用撇嘴压抑泛起的恶心,假装随意地从标本瓶中抓起最小的那条蚯蚓,摔在解剖盘中。心理又开始暗自庆幸,还好面对的不是蜗居在肠道内泛着白光的蛔虫。

想象一下你是否能够忍受,用裸露的手指,给一条在药水中泡得发白的死蚯蚓开膛破肚,从五花八门的内脏中翻出精巢和卵巢。如果你还能顶得住,请记住你的毫无防备的鼻孔就在15厘米开外(那是在你的眼镜还没有失踪的情况下)。福尔马林不会放过它。

福尔马林是甲醛的别名,只要不大口吞食基本上没有毒性,因此无防护作业是安全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很舒服。刺激的福尔马林能使蛋白

一要点,并用在死者颈部出现的严重损伤等等作为辅助证据证明疑犯的凶残,试图说服法官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,而辨方则逼迫控方向法官交出了关键性证据:多次性行为发生时的录音,录音足以证实入江冬香多次要求疑犯掐颈并“掐死”她,从而试图证明入江冬香试图自杀,疑犯不过是协助了这一过程,并把入江冬香的罪孽感解释为自杀动机。

当然,作为一个文学作品,必然还会有另外一个人,也就是作者的观点。作者试图通过村尾菊治被判故意杀人处8年有期徒刑后,收到一封入江冬香夹在书中留给母亲的遗书来解释这一切:入江身处爱和不能爱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,决定自杀,并选择村尾菊治作为执行人。

绝对的败笔。哪怕仅仅从文学角度这也属于画蛇添足: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远不如留给读者自己

●蒙木 原名高立志,文化保守主义者,从业新闻编辑多年后转出版编辑至今,致力于多出两本两年后依然有人爱读的书。

汉语对汉语的所谓翻译

《尤内斯库画传》终于上市了。几年来,几乎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接到作者黄晋凯教授的短信问讯:戈多会不会来?他说这本书的命运就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。其实等待戈多的并不是黄教授一个人,资深翻译家张玲、李文俊、汤真、刘季星、谷羽、万紫等几位先生的书,还有故去的施咸荣、梅绍武先生的遗作结集,都依然在荒诞中漂泊,像欠了债,这让我格外愧疚于心。不久前闻得著名翻译家方平先生故去,我愧疚之上又多了一层惊悚。

这几本书稿,以及已见天日的《牌戏人生》《世界文学巅峰五人传》等都本属于我策划的“世界文学第一线”系列,该系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,为此我还曾到上海拜会了草婴、万紫、方平诸先生,到江西拜会了汤真先生。但后来因为先行的《世界文学巅峰五人传》销售平平不能实现预期利润,所以此后每一本书出台都变得异常艰难。出书,毕竟不是编辑一个人的事。就个人讲,我可以不计报酬地向读者推出我喜欢的作品,但我不能要求别人去为微利甚至无利的工作奉献。

为什么会想起“世界文学第一线”?并不单单是我有感于那么多老翻译家在陋室中默默无闻地写作(卞之琳有文章《漏室鸣》),也不单单是有感于这个群体中有那么多可爱的人,更重要的是,我有感于中国翻译传统的危机,我认同王小波的论断: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,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。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。

王小波主要是针对傅雷、汝龙、王道乾等人的翻译作品下这个论断的。他们站在世界文学的第一线,为中国文学输入营养。我们不知道如果天假以年,让王小波看到近些年盛行不衰的攒书,他会说出怎样的话来?一个业内朋友给我指点迷津,攒书比原版的都好卖,为什么呢?因为攒书更贴近中国的市场,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不少貌似翻译的书,其实完全属于攒书的范畴,直截是汉语对汉语的改写,目的1.规避版权,2.提高出书速度,3.降低成本。这种攒书许久以来都是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,不需要执笔者对照外语原版书,甚至不需要执笔者懂外语。如果在一个素质高的书商那里,也许他还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好本子来改写;如果落在低劣的书商手里,被用来改写的本子本身就是蹩脚的不可靠的译本,最后以讹传讹,贻害读者。为了变换个说法,最基本的判断句都被改得面目全非,例如“他死了”一定变成“他撒手黄泉了”或者“他一命呜呼了”,改写者没有时间和精力权衡“死”“撒手黄泉”“一命呜呼”之间的褒贬意蕴,很多花哨的形容词被认为是文采斐然。买这样的佳作,笔者认为还不如买盗版书。

新老翻译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对汉语的认识。我听到有人攻击绿原、戈宝权、查良铮等人的翻译,攻击戴望舒、王央乐等人的西班牙语水平。但我没有看到攻击者拿出更优秀的翻译作品。一点可以认定:即使目前我们的外语水平在提高,但我们汉语造诣无疑越来越低了。我们不需要去追寻周作人、林语堂、杨宪益等人的国学底蕴,单单看看罗念生、巫宁坤等翻译家的创作,就该知道自己的差距了。这就是我策划“世界文学第一线”的初衷:给我们的创作一个标杆,给读者一个寻找译本的依据。假如你要买汉语的莎士比亚,并不是可以买随便哪个出版社哪个本子的;即使你不明白朱生豪、梁实秋、卞之琳、孙大雨、方平几位风格的差异,也不可以买完全没有听说过名字的人几个月赶出来的东东。

(待续)